

序

钟文典

唐凌教授主持撰写的《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即将付梓面世了。这是一部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到研究成果都有新意的学术专著，是一支年轻的学术“团队”经过多年努力取得的研究成果。

自从 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对外开放“五口通商”以后，强迫中国开口通商成了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被迫开放的通商港口也就成了外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并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多方面侵略我国的重要据点。因此，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教学和研究中，从被迫对外开口通商的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已是大家用以说明问题的重要依据。但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 19 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国难的加深和民族意识的提高，一些开明的官绅提出变法维新，收回利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自己宣布对外开放的商埠。它在抵制外国侵略，维护国家利权，发展社会经济，推动社会

进步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事实告诉我们，要了解中国近代史，特别是 20 世纪初期的社会变迁史，注意外国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埠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同时，还必须从自开商埠这个角度，研究“内力”可能发挥的作用，才能使问题得到全面、合理的解决。基于这个认识，著者把对自开商埠的研究作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窗口。通过新的视角、新的途径取得新的成果，为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提供有力的依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自开商埠这个窗口，著者为我们展示了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许多问题。全书五章，首先从 19 世纪末的中国和世界大势综论了清末自开商埠的背景；进而选取吴淞、南宁、昆明和三都澳几个不同类型的自开商埠进行具体分析，阐明它们的异同，说明各自的特性，了解个案与整体的关系；继之着重论述了自开商埠的近代工商企业、银行业、交通业、关税收支、市场发育以及城市近代化的关系；然后就中国近代约开商埠和自开商埠，以及中国、日本两国开埠的特征、效果及其原因等进行了比较。通观全书，观察问题的视野是广阔的，论述问题是有理有据、深入细致的，显示了深厚、邃密的学术内涵。

从总体上看，近代中国的自开商埠，开放的时间、数量、分布以及影响等等，虽然都远逊于约开商埠，但它所涉及的问题却十分复杂。第一，它是在民族矛盾日益深重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是维护国家利权和民族意识高涨的表现。但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强迫开埠中捷足先登。他们从沿海、沿江和沿边的开埠区位选择上占尽地利，同时享有减税免厘等特权。这就决定了自开商埠在迎接外来的挑战中往往居于劣势。第二，从综合国力考察，当时的中国举凡科学技术、交通运输、工业生产、经济实力和商贸竞争意识等都远落后人；而且自开商埠多是一个地区、一部分官绅的行动，并未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经济

行为，这又难免在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中步履艰难，无法取胜。第三，中外古今的历史证明，锁国封关必招致落后，丧失进取与活力，最终被动挨打；对外开放，广为交流才能进步发展。但是，要在对外交往中稳操胜券，自主抉择的权力和正确扬弃的能力至关重要。清末那些力主自开商埠的官绅们，其勇于对外开放，迎接外来挑战的精神值得赞扬，但他们面临的处境和条件却十分不利。结果国家的利权并不能有效地保住，而渴望的“富强之道”也难以找到。综上所述归结到一点，自开商埠的成败得失，实取决于国家的主权与国力。主权在我则兴，主权在人则衰。《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研究，为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把握现实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历史借鉴，而主权和国力问题，就是它为我们提供识古通今的主要历史经验，也是它的重要社会意义所在。

据我所知，主持和参与这个课题研究的都是年轻人。他们之中，有教师，有在学的研究生。唐凌同志是年轻的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西高校中国近代史学科带头人。在他的主持下，这支队伍以顺应历史科学发展的需要和时代呼唤为己任，力戒急功浮躁，通过师生结合，教学和科学研究结合的方式，发扬“团队协作”的精神，历时多年，终于取得了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的双丰收，这是十分难能可贵和令人高兴的。

由于自开商埠的研究属于前沿性的课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有关的资料残缺不全，因此研究的成果存在某些不足是难免的。我们赞赏的是这支年轻的学术“团队”对待学术的严肃态度、严谨学风和严格的自我要求的精神。正是依靠这种态度和精神，他们才会自觉地学习有关的理论和方法，艰苦搜集有关资料，在自开商埠的研究中取得了填空补缺的成果。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2001年6月8日于桂林靖江王城

导 言

自开商埠：透视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一个窗口 ——兼论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及方法

—

中国近代史上，商埠的开放与城市的兴起、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商埠的开放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外国列强通过强迫中国统治者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开放的，称为“约开商埠”；另一种是中国统治者自动开放的，称为“自开商埠”。目前，国内外对中国近代商埠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约开商埠”这一类型，具体成果主要反映在“中国现代化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中国近代贸易史”、“区域史”等方面的论著里。其基本模式是“外国列强侵略——签订不平等条约——商埠开放——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这种研究从一个方面展示了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历程。但是，中国对外国列强经济侵略的反

映并非始终都是被动的。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和资本输出的不断深入，民族危亡日益严重，民族爱国运动持续高涨，中国统治阶层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大力主张主动开埠，发展经济，加强商战，以此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振兴民族经济。由于种种原因，自开商埠的研究迄今仍属薄弱环节，这就使人们在认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规律时带有不少局限性。我们认为，应当把自开商埠置于中国和世界近代的历史背景之下，抓住它与约开商埠的不同之处，按照“民族危难刺激——自开商埠——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思路进行研究，从新的层面展示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特殊历程。只有这样，才能使对商埠的研究不断完善，进而才能更全面深刻地认识近代中国社会。

这种思路与中国近代历史主题是相吻合的。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民族运动。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争取民族独立，二是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不能相互代替。自开商埠是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探索。虽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顽固势力的压迫及破坏之下，自开商埠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效，但是它丰富了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内容，为这一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动力却是不争的事实。以自开商埠为基点，深化对中国近代历史主题——民族运动的认识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二

自开商埠是世界资本主义时代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自开商埠的出现却有特殊的背景，其类型、开放途径、功能等也不尽相同，带有较鲜明的国家

及民族特征。本课题正是围绕这些特征来开展研究的。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根据上述总体思路和中国自开商埠的基本特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及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方法，对有关的问题进行论证、分析，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现阶段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自开商埠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这涉及社会现代化的有关理论和实现途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实现现代化的任务，社会的现代化大致有两种模式，一种称为“早发内生型”，另一种称为“后发外生型”。前者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后者在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除了依靠自身的力量外，还要受到外力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属“后发外生型”。自开商埠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它在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内力”和“外力”的关系。在顺应世界时代发展潮流的同时，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利益，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才能站稳脚跟，走出困境，踏上坦途。由于不同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对不同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认识及把握有所不同，因此，各自开商埠有不同的结局。我们在研究中努力通过对自开商埠发展道路的探寻，思考近代中国在参与国际竞争中的基本态势，并对其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实力，所进行的选择，所制定的方略等进行评判。我们认为，中国现在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很需要从历史上获得这些方面的借鉴。

（二）如何看待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中国自秦汉以来，自给性的小农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到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虽然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只是自然经济的补充。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对西方世界开放，逐渐形成了“沿海”与“腹地”的概念。沿海地带从古老传统经济中剥离出来，开始

了自己孤立的现代化发展。人们期望这些地区的现代化因素能够向传统地区胜利地扩张传播，产生“扩散效应”，用现代化的“中心”带动传统地区的“边缘”，使现代化成为一种全国性整体进程。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化建设地区与传统地区不仅没有形成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反而呈现出互相封闭和排斥的关系。于是，一种两极化的现象出现了，当现代地区和部门变得越来越现代的同时，传统地区和部门变得越来越“传统”和落后，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结构”（或二元经济、二元社会^①）。自开商埠大都开放得比较晚（具体时间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它们的出现，目的之一就是在腹地形成现代化的中心，为先进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缩小沿海与腹地的差距。但是由于它们不同程度地游离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与沿海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方向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并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自开商埠在近代中国经济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它们与中国的自然经济和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应建立什么样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其发展变化呈现出哪些重要的规律及特点？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尽量予以回答。事实告诉我们，二元经济结构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之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一种客观存在。直到今天，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仍是这些国家或地区非常艰巨的任务，必须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地进行探讨，因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会使二元经济结构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我们之所以着力研究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就是想使人们能从中掌握一些处理这种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并使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参见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2），221 页。

义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如何评价自开商埠的交往形式及层次。交往作为一个历史学概念，是指历史实践活动的主体（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为摆脱自身孤立发展的状况，与其之外的事物世界建立的往来，是通过历史横向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及基本形式，是人类横向的历史实践活动。经济交往是人类社会所有交往的基础，表现为商业、金融、交通等网络的形成，跨地区和跨国经济组织的建立等。近代社会的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交往的程度。正如恩格斯所说：“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①交往的性质有强制性的，也有自然性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商品的输入和输出，也有资本的相互流通，还有商人、企业家、买办的相互往来等。交往的层次参差不齐，有的在生产这一层面，有的在技术这一层面，还有的在经营管理这一层面。随着中国自开商埠的不断出现，如何进行交往也就成为当时社会所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许多自开商埠一方面彼此之间进行平等的经济交往，同时，也在各种压力下，与约开商埠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不平等的经济交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交往体系是一种级差型的结构，越是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在这种经济交往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就越低下。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的自开商埠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时候往往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外国侵略者用很低廉的价格，大量收购中国的各种农副产品和工矿业原料；同时，把大量的过剩商品销往这些商埠。这些交往的结果，使中国的利益受到了很大损害。一些靠近沿海地区的自开商埠力图引进先进的技术及经营管理方法，均未能完全奏效。与约开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368页，人民出版社，1961

埠相比，自开商埠的经济交往层面始终是比较低的。然而，历史又无情地昭示着国人，闭关锁国只能扼制活力，使自己丧失进取，结果是落后挨打，亡国灭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究竟如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往？评价自开商埠的交往形式及层次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怎样才是真正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开埠过程中，能否采取其他的交往方式？我们通过研究找到了一些答案。但是我们认为这些答案的正确性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随着世界一体化趋势的加强，需要更深入更全面地研究经济交往问题。我们希望能通过对自开商埠经济交往形式及其层次的研究，引发人们对国家和民族交往问题的更为深刻的思考。

（四）如何理解自开商埠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包括民族意识、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等。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民族精神通过各种方式相互渗透及影响。进入近代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民族精神的渗透力更为强大，影响也更为深远。在中国自开商埠建立及发展的过程中，民族精神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但是，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时作为这种精神的载体，主要集中在官绅阶层。因此，研究时不能不把握好分寸。我们认为，官绅阶层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在当时具有一定代表性，但是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必须将他们所体现的这种精神，放在世界整体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看看它是否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是否真正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另外，不要空洞地孤立地论述这种精神，而应通过展示自开商埠的具体实践活动，使人们从中得到感悟。

（五）如何认识自开商埠所建立的有关制度。社会制度的变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任何制度都源于对生产成本的节约。能否建立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并在实际运作中能充分发挥其效能的制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发展。许多

自开商埠建立后，都制定了一些管理方面的制度。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时期，这些制度所发挥的效能不尽相同。研究这些制度，不仅可以使我们认识近代制度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关系，还可以明确当今面向世界整体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由于资料的限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只能是比较粗浅的，但我们仍要把着力点放在这方面。因为这是目前自开商埠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现有的成果对自开商埠有关制度的认识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的研究能有一点突破，都会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因而是值得为此努力的。

（六）如何分析评价自开商埠的作用。中国的自开商埠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及消亡是很短暂的，但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在中国近代史上却发挥了较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提高。有些自开商埠旋起旋落，作用时大时小；有的有其名而无其实；有的主要为现代经济服务，有的为传统经济服务；有的具有较明显的现代特征，有的则作为封建势力的集中地而存在；等等。自开商埠的不同命运，既取决于开埠者的指导思想及管理水平，也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及市场发展的水平，还取决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等。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在研究中既注意发现其个性，也注意总结其共性，对其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较为准确地勾勒出自开商埠在中国近代社会进程中的活动场景

除此之外，我们着力研究的还有自开商埠的分布地区、开放经过、商品结构、行业特点及其对后来社会的影响等。

三

不管什么方面的研究，我们始终牢记一个基本原则，即把自开商埠作为透视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一个窗口，通过全面深入地挖掘有关自开商埠的资料，多层次多角度地对其进行研究，力求使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规律及特点能得到新的展现，提高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水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采取了以下研究方法：

在第一章里，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自开商埠进行综述，论述的重点是自开商埠出现的历史背景，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由思想到实践的发展历程，目的是使人们从总体上了解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的概貌。

在第二章里，我们选取吴淞、南宁、昆明、三都澳四个自开商埠作为个案来进行研究。其中吴淞是最早自开的商埠之一。它位于约开商埠上海的附近，而上海又是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最强大的地区之一。吴淞两次自动开放均未能获得应有的成效，其失败的命运说明，外国列强不会让中国独立自强；南宁属内地沿江商埠，其开放以后，虽然在维护主权，扩大经济交往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由于长期以国内贸易为主，商品流通大都限于内河流域，因此很难“分洋利”；昆明位于西南地区，当时这里闭塞、贫穷、落后，商品经济力量薄弱，缺乏实业基础，市场狭小。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昆明无法有效地发挥商埠作用，只是后来随着交通条件的逐渐改善和近代工矿企业的兴办，才具备一些近代商埠的基本特征；三都澳位于闽东地区，虽然在地理上靠近东南沿海，但是山区市场与沿海市场毕竟有着很大的差别。开埠

者企图以沿海地区的商埠形象来塑造三都澳，结果却是“淮橘北枳”。这几个商埠是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的代表，选取它们作为个案来进行研究，有助于对其开放过程及其类型的了解。为增强研究的实效，我们在较详细地对自开商埠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重点找出其特征，突出其个性，并正确处理个案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使人们能在较丰富的历史底蕴的基础上，认识这些自开商埠。

在第三章里，我们着重对自开商埠的行业及其功能进行研究。当时，自开商埠建立后所出现的新行业主要有工商业、银行业、交通运输业等。我们首先把自开商埠里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汇总，然后分门别类进行考察，区分其本质上的异同，再进行综合分析评价。鉴于各自开商埠的资料比较零星分散，我们尽量运用计量和定量分析的方法来进行处理，如果资料实在很难成系统，则加强实证工作，使用于立论的资料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自开商埠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城市近代化方面的功能，涉及许多地区和部门，不可能进行全景式的演绎，因此，我们只能进行概要性的说明，同时，选择一些实例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证。我们还根据资料条件，尽可能分历史时期和地区对自开商埠的功能进行评论。我们觉得，这也许有利于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使人们能更好地认识自开商埠的功能。

在第四章里，我们着重将近代中国的约开商埠与自开商埠进行比较研究，目的是进一步深化对自开商埠的认识。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近代中国的约开商埠和自开商埠是两种类型的商埠，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性。根据社会科学研究的有关规范，我们在选择比较的参照系时，坚持历史性、有限区域性、同构性、整体性等基本原则，按照上述基本内容及思路，分别从开放背景、开放途径、经营管理、经济功能等方面进行比较。具体方法主要是横向共时性比较，也有适当的纵向历时性比较。在开展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开列重要的基本史实，另一方面则对两者

的差异性及其相关原因进行较为具体的论述。比较的面虽然有限，但我们认为，这几个因素已经能较清楚地揭示出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在实质上的差别，使人们能了解它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作用和不同的命运。当然，如果比较的面更广阔些，形成的认识也许会更多、更深刻、更正确些。然而，目前的研究条件决定了我们暂时只能做到这一步。

在第五章也就是最后的一章里，我们把近代中国的自开商埠与国外的自开商埠进行对比研究，力求从更高的层面来认识近代中国的自开商埠。之所以把日本的自开商埠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是考虑到日本在近代与中国的国情基本相同，即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基本模式都属“后发外生型”。而且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在整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两国基本同属一地，这些，使我们在研究时对参照系的选择有着较多的一致性。日本自开商埠成功地实现了自主、自立、自强的目标，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而中国却未能做到这一点。造成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应该从中得到哪些重要的启示？我们着重从两国文化及民族心理方面条陈己见。因为，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近代中日两国的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是很不相同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才使两国的历史发展出现了错位。

四

历史是人类社会以往所经历的过程。它不能再现、重复，因此，历史认识是一种模糊性认识。而历史研究，则要求我们尽量地减少这种认识的模糊性，提高清晰度。以自开商埠作为透视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窗口，使我们看到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

一些新的情景。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而呈现出来的这些新情景是较全面的、立体的，而且是较真实可信的。但是，自开商埠毕竟只是透视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窗口，这个窗口肯定会对我们的视角和视线造成不少的限制。我们的认识肯定会有不少的失误。今后，我们会继续凭借自开商埠这一窗口，寻找新的视角；同时，我们也会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攀登，在新的高度上，通过更多的窗口来透视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历程。

这是历史科学发展的需要。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我们的信念和追求。

第一章 自开商埠的历史背景

中国近代的自开商埠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出现的。它既是世界潮流推动的结果，也是中国封建统治者思想及统治政策改变的产物。

一、世界历史的新发展 与中国的自开商埠

自 1898 年始，清朝政府为杜绝外人凯觐，在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商业繁兴的地区主动陆续开辟了一些口岸，这些口岸与按照不平等条约被迫开放的“约开商埠”相对而言，被称为“自开商埠”。事实上，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的“自开商埠”，既以缩影的形式记载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历史的新发展，又反映了中华民族在面对历史赋予的机遇和挑战时，递交的一份并不完美的答卷。

（一）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世纪之交——自开商埠产生的大背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整体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先进的民族国家纷纷以第二次科技革命为推动力，紧紧围绕生产力这一人类历史进程的主轴不断向前迈进，从而大大推动了民族历史向世界的转变和全球经济体系的发展壮大，奏响了新时代转变的宏伟乐章。

首先，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纵向来看，科技革命的巨大动力，为后进国家实现赶超先进国家的梦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的历史性突破，成为世界历史新发展的动力源泉。19 世纪中叶以科学理论的巨大突破为先导的科技革命，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远非第一次技术革命所能比拟。以电磁理论为指导的电力技术的广泛开发和应用，解决了新的历史条件下能源开发滞后的状况，电被充分应用于人类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继蒸汽时代后昂首步入电力时代，以内燃机的发明和运用为前提的运输工具的改进，使交通运输革命一发不可收拾；以化学工业为基础兴起的医学、卫生、人工合成等新兴产业，极大地造福于人类社会；转炉法、平炉法等现代炼钢技术的发展又大大推动了钢铁巨龙的腾飞。从这一意义上看，人类社会又从轻工业为主的纺织时代进入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钢铁时代。正是在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排山倒海的伟力推动下，人类终于摆脱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樊篱，过渡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世界大工业文明建立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揭开了。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的历史性突破，不但对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赋予了现代化进程中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历史的机遇已悄然出现在眼前时，谁能真正抓住转瞬即逝的光阴，占领时代的制高点。不难看到，以

美、德、日、俄为代表的后进国家，在历史的机遇悄然而至时，无一例外地牢牢把握了历史跳动的脉搏，在重视科学理论和科技革命的基础上，以重工业为依托，吹响了赶超世界先进工业国家向现代化迈进的嘹亮号角。

其次，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横向，即世界交往和民族竞争的角度来看，在世纪之交的钟声即将敲响时，后进民族国家面临着更为沉重的压力和挑战。以科学技术为其发展根本动力的世界大工业文明，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市场的扩大和全球经济体系的纵深发展。“原来以区域性自给自足的易货贸易已融为全球性的单一经济……至 19 世纪末，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金融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相互联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①与此同时，世界市场的格局也发生了斗转星移的变迁，世界经济由英国独执牛耳的时代进入了群雄逐鹿的时代。另外，各先进民族国家的经济运作方式也在世界市场的风雨锤炼下变得更加成熟。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旧式的生产呈无政府状态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终于过渡到有组织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其对外扩张也相应发展到以资本输出为主要手段。“事实依然是，新的工业社会有着贪婪的胃口，由于其根本无法从本地资源中获取充足的供应，它正迅速地吞噬着整个世界，……这时工业正走向世界去寻找基本原材料，而没有这种原材料，新形式下的工业就无法生存。”^②

应该看到，世界市场的扩大和全球经济体系的纵深发展，从来就不是以田园诗般的情调进行的。在划时代的变迁面前，每一个民族不仅面临着相同的历史契机，而且面对着同样残酷无情的

①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47—48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②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46—47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